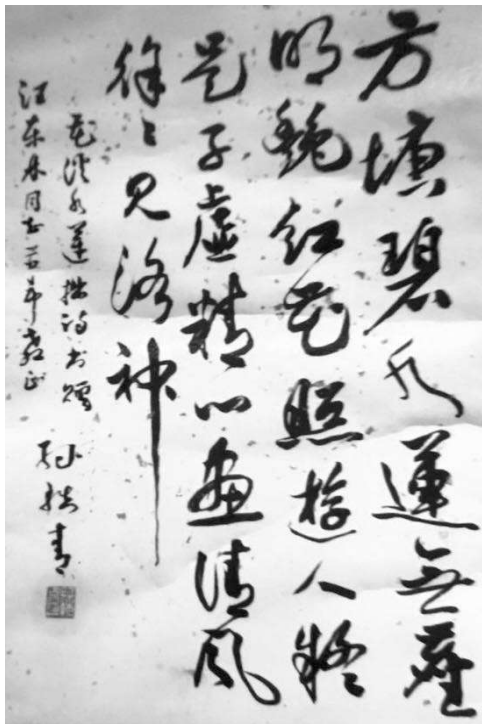


亦师亦友孙轶青

汪东林



▲1993年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期间，新闻出版界委员的合照。前排坐者右二为孙轶青，站立者左八是本文作者汪东林。



▲1984年贵州之行的一张照片，中间是孙轶青同志，左边是本文作者汪东林。
▲1984年贵州之行孙轶青赠送给本文作者的墨宝，已保存了30个年头。

争当一名作家。尽管在大学时代开始，就时断时续地经历批判成名成家的教育，但内心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多年的追求和梦想。真想不到人到中年，遇上机会从机关干部转身成为记者，虽然还没有申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资格，但毕竟我已经写了许多文章，还出版了第一本书，发行量达100多万册，也算得上即将进入名记者之列。听了孙轶青同志的一番真情实意的鼓励，正中下怀，信心满满，更应该奋发努力拼搏一番了。

小记者住大套间

其实我对孙轶青同志的敬重，并非开始于这个个别谈话。还在此之前的1984年上半年，全国政协组织由2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组成的赴贵州省视察团，由孙轶青同志任团长，有两名副团长，我是唯一一名随团的新闻记者。其他随团工作人员由全国政协机关人事局局长杜文亮带队。刚刚到达贵阳宾馆，杜文亮同志即找我谈：“宾馆住房有困难，孙轶青副秘书长你去解决难题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您直接告诉我，这还非要劳团长的驾？”杜文亮说：“不行，他要直接同你谈。”

我们进了团长的套间，孙轶青同志招呼我们俩到里屋坐下，笑嘻嘻地操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：“本来贵州省政协给我们视察团准备的住房，政协委员和工作人员都是两人住一个标准间，团长、副团长一人安排一个套间，但情况突变，套间只剩两个，团长一间，两个副团长只有一间套房，让谁住都不合适，别的房间又没有了，我们研究决定，两个副团长一人住一个标准间，他们都乐意，你的标准间（对记者的照顾）让出来，搬到套间来住，好不好？”

我听了不答应：“我不能住套间，不合适，要让让社长住！”孙轶青同志一乐，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接受不了，所以我直接找你谈。这事就是同杜文亮商定的，他住不合适，你住合适！过去说记者是‘无冕之王’，现在说工作需要，白天晚上都有工作在身，再说房间数量就这些，多一间都没有。你就放心住下吧。”

我无言以答，只好接受安排。自1962年至1984年，我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已22年，我跟随全国政协委

员和机关领导出差甚多，但住套间却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！这次随团采访十余天，先在贵阳，再去外地。由于没有带秘书，考察团里的事情孙轶青同志找杜文亮，因为我住他的隔壁，若干事务性的工作，我这个“临时秘书”就主动做了。

除了视察团的工作他全面负责，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中国诗词和书法的酷爱！他说：“新中国成立后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负责办报，这项工作已告一段落。我爱读诗、写诗，也爱书法。中国是诗词之国，源源不断，传承2000年，世界独一份！”他随身携带诗集和文房四宝，几乎每天一有时间就研读诗词，一起念就写诗。他还常常与同行的人探讨中国诗词。

在贵州十多天，他差不多一路走来，一路写，凡同行的人和所到之处的主人提出，他都集中时间铺纸挥毫，一写就是若干张。我发现，他还带着贵州省地图和参考资料，在到新地方之前就查看一番，常常在行车过程中构思诗作，届时落笔成章。因为我常在他身边，他曾对我说，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无准备之仗，写诗词也不例外。当然，写诗是动于情、出于声，不能硬作，但你去一个新地方，必须先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，先了解一个大概，到了现场才更能即兴发挥，诗词脱口而出。

这次贵州之行，孙轶青同志作诗多首，送别人的墨宝大多是旧作，但就当地名胜古迹所作，却都是新作。因为我一路都不好意思张口向他讨要墨宝，在结束贵州之行前夕，轶青同志主动送我一幅墨宝，保存至今已30个年头了。

“殚精竭虑，积劳成疾”

当时，有好些老前辈如赵朴初、钱昌照、周谷城等都支持成立中国诗词学会的盛举，从上而下的广大诗词作者和爱好者更不必说。但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中坚力量，孙轶青同志就是中国诗词学会成立的倡导者和实干者之一，称得上是实际上的领军人物！他主持制定《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》，推出自己的《开创诗词新纪元》文集、《孙轶青诗词集》等著作作引领，在各项诗词活动中上下沟通，联系各方，在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后，他支持更资深的人士当会长，依然忘我地以身作则，埋头实干，直至自己接任会长。

超龄后仍受到一致推崇，留任到2009年，87岁的他病倒在推动诗词工作的岗位上。所谓“殚精竭虑，积劳成疾”这8个字，用在孙轶青同志20余年如一日、一心扑在中国诗词传承和发展事业上，真是恰如其分！孙轶青同志在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任上，被授予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，完全是众望所归！

1985年孙轶青同志找我个别谈话8年之后，即1993年全国政协换届，经组织上推荐又经过协商筛选，我有幸成为新闻出版界的全国政协委员。已经担任过第六届、第七届新闻出版界全国政协委员，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孙轶青同志，仍然留任第八届新闻出版界的全国政协委员，即与我同界同组。

当新闻出版界的新委员名单公布的时候，至少过半数是新闻出版界的前辈，包括孙轶青同志在内。其时孙轶青同志72岁，已退居二线。我一查资料，委员名单里年过七旬的大有人在。正在报社岗位上忙碌且比前辈小差不多20岁的我，也成了新闻出版界的一员，心中欣喜，又自愧不如。

前几天，我就匆匆赶到红霞公寓看望孙轶青同志，这位自称红霞寓公的老前辈、老领导同我紧紧握手，立即对我表示祝贺：“看见人民日报公布的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了？你与我同在新闻出版界，我已连任第三届了，早该退了。但你是新生力量，才50多岁吧，来日方长，要谦虚谨慎，加倍努力，作出更大业绩！”我回答：“是组织上信任我，我是小字辈，是不够格的！感谢您七八年前就教导我，关心我，鼓励我，我一直铭记在心！”

我们的谈话差不多有个把小时，因为他还约了别的客人，我才告辞。临走前他还对我说：“这下子好了，政协委员的标准同你一样了，我很喜欢其作品中的文字之美、意境之美和静穆之美。于是，就在当月刊发了沈从文的3篇作品。之后，徐志摩还与沈从文见了面，又从他那取回一摞稿子。次日，徐志摩又刊发沈从文各类作品达7篇之多。当时，《晨报》非常有影响，徐志摩的这份提携和看重，对于举步维艰的沈从文来说，真可謂是“及时雨”。

有一次，徐志摩从编辑部先前的废稿里，扒出了沈从文的散文稿《市集》，认为这是一篇“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”。刊发时，

文人轶事

WENREN YISHI

鲁迅和标点符号

王吴军

陈望道是提出使用现代标点符号的第一人，他在1918年5月，用文言文写了《标点之革新》一文，发表在《文艺》杂志第3卷上，提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。

接着，1918年5月号的《新青年》杂志响应了陈望道的号召，在该期《新青年》杂志上，除了全部用白话文外，还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。

不久，陈望道又写了《新式标点的用法》，发表于1919年的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》1至5号上。1919年11月29日，周作人、朱希祖、刘复、钱玄同等人向当时的政府提出一份《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》的建议。1920年2月，当时的教育部以第53号训令的形式通令全国采用、推广标点符号。

鲁迅对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倡议不仅热烈拥护，而且在写作中积极地加以使用。对于推广和使用标点符号的艰难历程，鲁迅在《忆刘半农君》一文中曾写道：“十多年前，单是提倡新式标点，就会有一大群人‘如丧考妣’，恨不得‘食肉寝皮’。”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推广和使用标点符号的真实情况。

当时，有些新文学作家在使用省略号时，往往任意延伸，有的作家写一个省

略号竟长达大半页之多，好像有什么神秘似的，对于此种怪现象，鲁迅在《“……”“□□□□”论补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在洋书上，普通用六点，吝啬的却只用三点，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，同化之际，就渐渐长起来，九点，十二点，以至几十点。有一种大作家，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，以见其中的奥义，无穷无尽，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。”

鲁迅在写文章的时候，发现报社、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重视标点符号，在支付作者的稿费时，大都要把标点符号和空格从字数中扣除，不给稿费。

有一次，鲁迅应约为某出版社翻译一本书，他事先得知这个出版社不支付标点符号和空格的稿费，于是，就干脆把已完成的译稿从头到尾连接起来，不让稿纸上有一个空格，既不分章节、段落，也不加标点符号。译稿寄出去的几天后，出版社就把鲁迅的这份译稿退了回来，并附了一封信，让鲁迅分回章节、段落，再加上标点符号。鲁迅回信说：“既要作者分段落、加标点符号，可见标点符号和空格还是必需的，那就得算字数了。”那家出版社没有办法，只好采纳了鲁迅的意见，把标点符号和空格也都支付了稿费。

文人轶事

WENREN YISHI

老舍“物归原主”

崔鹤同

1957年，吴祖光被下放到了北大荒。吴祖光去后不久，有一家画店找到新风霞买下吴祖光收藏的齐白石、徐悲鸿等画家的画。新风霞把许多吴祖光喜爱的画都给卖掉了。譬如吴祖光最爱的一张《七雄图》，是齐白石画的一幅七只大公鸡的大画，还有《玉兰》等等。

1960年，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，一家人又团聚了。一天，新风霞和吴祖光在王府井大街散步，远远看见老舍拿着拐杖也在散步。老舍看见他们很高兴，冲他们招手。他们快走了几步，向老舍问候。老舍说：“走！到我家去。”吴祖光，我知道你回来了，正要找你。”新风霞和吴祖光就去了老舍先生家。

二人在外间屋喝茶，老舍进了他的

小套间。不一会儿，他手里拿着一张画出来，笑着说：“吴祖光，这是你的画，现在还给你。”新风霞和吴祖光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什么时候有画放在老舍家？吴祖光接过来一看愣住了！这是齐白石画的一幅《玉兰》，当年被新风霞卖掉了的，怎么会到了老舍手里呢？

老舍说：“这张画是我在画店买的，回家发现在画轴上有吴祖光的名字，知道这是你的画，当然应当还给你。这叫物归原主。”老舍在画的边上写了一行小字，大意是说某年某月在画店买到这幅画，“还赠吴祖光物归原主矣。”吴祖光当然是既高兴又感动。他问老舍是多少钱买的，老舍说：“不用问，可惜没有把风霞卖掉的画全给你买回来。”

这句话让新风霞和吴祖光十分动容。

文人轶事

WENREN YISHI

钱穆“上辈子就是读书人”

万庆东

1895年，国学大师钱穆出生在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的钱家大宅中。父亲钱承沛在晚清中过举人，因为身体虚弱放弃仕途，在家教书，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富裕。

钱家有一个祖训，“子孙愚陋，诗书须读”。1901年，钱穆进入私塾启蒙学习，虽然他年龄小，但聪慧过人、日记百字。父亲称赞钱穆：“肯定上辈子就是读书人，日后必成大器。”

1906年，钱承沛病逝，临终前对钱穆的遗言唯有一句：“汝当好好读书。”此时孤儿寡母，家道中落。但钱穆的母亲坚持不让孩子辍学，她曾言：“我当遵先夫遗志，为钱氏家族保留读书种子。”于是，哪怕是穷到年夜饭都是族人施舍，仍设法让钱穆兄弟继续学业。

1907年，钱穆成功考取常州府中学堂。钱家的同族钱伯圭知道钱穆家境贫寒，便资助钱穆前往中学读书。在常州

府中学堂，钱穆遇到了日后成为大历史学家的吕思勉先生，得到了吕先生的欣赏和教诲。

1912年，受时局和家境的影响，钱穆中学没有毕业。经亲戚介绍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，这一教便是十年。钱穆一直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为遗憾，但他勤奋自学，读书极勤，曾言“吾虽穷乡，未尝敢一日废学”。

钱穆一边教书一边写作。1930年发表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得到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赏识并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，并在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兼课。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自学者居然同时在北京四所著名大学执教，一时名动京城。

钱穆一生著有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《国史大纲》等80余种专著，与吕思勉、陈垣、陈寅恪并称为“史学四大家”。

文人轶事

WENREN YISHI

徐志摩提携沈从文

王剑

对于沈从文而言，徐志摩无疑是他创作路上遇到的“贵人”。

1923年，21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平，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。每天清晨，他匆匆啃几口冰冷的馒头，就赶着去听课。课余时间，他不停地写诗，但投出去的稿子，却如泥牛入海、杳无音讯。沈从文的生活一时陷入了困境。

1925年10月，鼎鼎有名的徐志摩出任《晨报》副刊主编。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沈从文，很喜欢其作品中的文字之美、意境之美和静穆之美。于是，就在当月刊发了沈从文的3篇作品。之后，徐志摩还与沈从文见了面，又从他那取回一摞稿子。次日，徐志摩又刊发沈从文各类作品达7篇之多。当时，《晨报》非常有影响，徐志摩的这份提携和看重，对于举步维艰的沈从文来说，真可謂是“及时雨”。

有一次，徐志摩从编辑部先前的废稿里，扒出了沈从文的散文稿《市集》，认为这是一篇“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”。刊发时，

他情难自禁地写了一段“志摩的欣赏”：“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。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，处处有着落，却又处处不留痕迹。给这类的作者，批评是多余的，因为他自己就是最不放声的不出声的批评者。奖励也是多余的，因为春草的发育，云雀的放歌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。”

徐志摩的扶植和奖掖，使沈从文慢慢在文坛立住了脚跟。不久，北新书局出版了沈从文的作品合集《鸭子》；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第一本小说《边城》。

对于徐志摩的知遇之恩，沈从文念念不忘。他曾感慨道：“没有徐志摩，我这时节……不到北平去做巡警，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，瘪了，僵了，而且早已腐烂了。”

1935年，沈从文在自己主持的《大公报·文艺》副刊上，组织了一期“徐志摩纪念特刊”。他在“附记”里写道：“死者的诗歌与散文，兼有秀倩与华丽，文字惊人眩目，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可以称为一朵珍异无比的奇花。”